

# 皇太极时期“盛京”之名的多重意蕴

王 佳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据档案史料,“盛京”在蒙藏文化语境中被视为“莲花盛开之城”,是“莲花净土”。“莲花盛开”象征佛教法运兴隆,这赋予了“盛京”原本汉语和满语意义上没有的内涵——“佛国”。由于蒙藏民族信仰佛教,定都“盛京”之佛教意蕴,以及在盛京修建实胜寺和四塔四寺等一系列活动,也是皇太极以佛教凝聚蒙古和西藏,形成对“大清”的国家认同。

**关键词:**沈阳;盛京;藏传佛教;实胜寺;法轮寺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22)03-0087-07

**DOI:**10.16415/j.cnki.23-1021/c.2022.03.003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将沈阳改名为“盛京”。“盛京”一词,在汉语和满语语境下是“兴盛”之意,并且与赫图阿拉城“兴京”相对应。但是,在蒙藏文化语境中,由于佛教信仰深厚,“盛京”被视为“莲花盛开之城”<sup>[1]</sup>,是“莲花净土”。这使得“盛京”获得了汉语和满语意义上没有的内涵——“佛国”。

## 一、满汉语境中的“盛京”

盛京(今沈阳),是清入关前的都城,康熙皇帝称“盛京为国家肇基重地”,乾隆皇帝言:“我国肇兴盛京”“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盛京为王化始基之地”,道光皇帝亦称:“盛京为我满洲根本之地”<sup>[2]</sup>。

《钦定盛京通志》载:“我太祖肇基兴京,筑新城于辽阳,天命十年以沈阳为盛京”,“天命十年升沈阳为盛京”<sup>[3]</sup>。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力排众议,自东京辽阳城迁都沈阳。他认为,沈阳方位、地形、物产、交通、营造等都较辽阳更有优

势:“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sup>[2]</sup>。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不久即去世。皇太极即位之后,继续修建沈阳城,营造宫室,历时5年,终于完成对沈阳城的改造。据《钦定盛京通志》卷十五《天章》描述:“盛京城高三丈五尺,周九里三百三十二步,为门凡八,南曰德盛、天祐,东曰抚近、内治,西曰怀远、外攘,北曰福盛、地载。宫城之制,左阙门曰文德,右阙门曰武功……太祖既迁都沈阳,至役尤,太宗遂即帝位建国谋太定,自是征明之为近便,而蒙古诸部落之来朝谒者并宴贲于此。”

天聪八年(1634)四月一日,皇太极颁布圣谕,从国家角度规范职官、城邑等满语、汉语新称,要求禁止使用以前的旧称,否则严惩。他将“沈阳”改为“天眷盛京”,将“赫图阿拉”<sup>①</sup>改为“天眷

①赫图阿拉,又作赫图阿喇、黑秃阿喇,意为“横岗”“横甸”,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老城村,1616—1621年为后金都城。

收稿日期:2022-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北藏传佛教历史源流和发展现状研究”(12CZJ006)后续成果

作者简介:王佳(1984-),女,辽宁沈阳人,博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佛教研究。

兴京”。从此,沈阳有了“盛京”之名。

上谕曰: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今我国官名,俱因汉文从其旧号……朕缙承基业,岂可改我国之制,而听从他国!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喇城,曰天眷兴京。毋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sup>[2]</sup>。

皇太极改“沈阳”为“盛京”,有意规范各种名称,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强大的国家意志和独立的统治秩序。此后不久,天聪九年(1635),又下令将族名称为“满洲”。《旧满洲档》记载:“汗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称诸申者则治罪。”<sup>①</sup>

兴京、盛京,在汉语是“兴盛”之意,满语名称与汉语相对应。“兴京”,满语拼写 yenden,意为“兴起、肇兴”。“盛京”,满语拼写为 mukden,音译“穆克丹”“谋克敦”,意为“兴盛”。可以说,在汉语和满语语境中的“盛京”,如其字面涵义“兴盛”“繁盛”,象征着都城和国家繁荣昌盛。

## 二、蒙藏语境中的“盛京”

虽然努尔哈赤早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就命额尔德尼仿照蒙古文创制满文,但是在明末清初相当长的时期,“蒙古文仍为其统治区内通行的文字,而新创制的满文尚处于试用、改进和推广阶段”<sup>[4]</sup>。时至崇德二年(1637),仍是“大小文字皆以蒙书翻译,进览于皇帝前”<sup>[5]</sup>。并且,大多时候,藏地往来文书也要依靠蒙古喇嘛作为翻译。由于蒙藏民族信仰藏传佛教,“盛京”也被赋予了新的佛教内涵——“莲花盛开之城”,代表着佛法兴盛之域。

崇德二年(1637)十一月十五日蒙文老档《皇太极致土伯特汗书》曰:

自古历代皇帝创业,佛法未尝断绝,朕已遣车臣顾实绰尔济<sup>②</sup>启程前往乌斯藏<sup>③</sup>。大呼图克

图<sup>④</sup>、藏王可不必遣使前来。凡所欲言之事,俱由朕使车臣顾实绰尔济面商。特此告知。

赐吉祥哈达,特以侑饘。

丁丑年冬月望日,于荷花盛放之城——盛京<sup>⑤</sup>

“土伯特”即“吐蕃”,当时的汗王是藏巴汗。在这封书信的结尾,“盛京”被解释为“荷(莲)花盛放之城”,其时正值“冬月”,这当然不可能是写实,乃是比喻佛法兴盛之所。荷花,即莲花,在佛教中具有特殊象征含义,代表佛法、佛教。这封书信的汉译文有多种,李保文先生将末尾这句译为“莲花盛开之城——盛京”<sup>[1]</sup>,李勤璞先生译为“盛开莲花之区盛京城”<sup>[6]100</sup>,希都日古先生译为“盛开莲花地方盛京”<sup>[7]28</sup>,译作“莲花”,更为准确。

自从皇太极颁布“盛京”规范名称,在官方文

① manju“满洲”一词,是缩合词,man-由满语 mang-ga“难、硬、强、优秀、高贵、善于”演变而来;-ju 是原始阿尔泰语 goro“箭”一词的词首辅音腭化演变的同时词尾语音连续脱落的结果。其语义为“强悍的箭”,这种表达法与满族及其先世的狩猎经济关系密切。(见长山:《满语词源及其文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21页。)至于“满洲”与“曼殊师利”发生关联,则是后来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缘故。

② 车臣顾实绰尔济,也作塞臣顾实绰尔济、色钦却杰、色臣国师绰尔济等。车臣,意为聪明;顾实即汉语“国师”音译,也作固什、固始等;绰尔济,意为法座、法王、寺主。车臣顾实绰尔济(?—1647),系清初皇太极延请五世达赖喇嘛的关键人物,是清廷与达赖、班禅双方共同的使者,四世班禅授予其尊号“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意为“佛祖使者”。关于其生平事迹考证,详见李保文:《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宝音德力根:《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③ 乌斯藏,指藏地。

④ 呼图克图,也作库土克图,指蒙藏佛教转世活佛。

⑤ 《皇太极致土伯特汗书》(1637),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14—215页。该书原译文将“车臣顾实绰尔济”误作为“车臣、顾实、绰尔济”三人,这里已作修改。

书满语为 mukden, 蒙古语采用的是满语音译借词 mukden。例如, 崇德三年(1638)《敕建莲华净土实胜寺碑记》满汉蒙藏四体碑文中, 对于“盛京”的翻译如下:

崇德三年(1638)《敕建莲华净土实胜寺碑记》  
四体碑文之“盛京”<sup>①</sup>

汉文碑	盛京	盛京西郊	(盛京)城西三里许
满文碑	mukden hecen 盛京 城	mukden hecen wargi 盛京 城的 西面	mukden hecen i wargi ilan ba 盛京 城的 西 三里
蒙文碑	①mükden qotan 盛京 城 ②mügden qota 盛京 城	mükden qota yin barayun eteged 盛京 城的 西 方	mügden qotan u barau 盛京 城的 西 eteged, , yurban koros ajar 方 三 俱卢舍②地方
藏文碑	pho-brang 殿堂③	pho-brang gyis   gyas kyi ngo 殿堂 的 右 的 方面	pho-brang gyas kyi ngos   殿堂 右 的 边 rgyang-grags gsum gyi 俱卢主 三 的 savi khyon-nyid 土地 的 范围

对于蒙古人来说,“盛京”是个相对熟悉的都城,采用了满语 mukden(穆克丹)音译。但对于藏人来说,盛京毕竟太过遥远,特别是对其新称“盛京”更感陌生,因此,碑文的藏文译者可能有意没有采取音译,而是模糊地用了“皇宫(所在的地方)——京城”来指代。实胜寺建在盛京“城西三里许”,藏文碑中的方位“右”,即是皇宫西侧。这和佛教的传统一样,佛像面南,依佛像之右手方向为“右”<sup>④</sup>。皇宫坐北朝南,所以西侧即右侧。

后来,藏文文献中也使用满语 mukden 音译<sup>[8]</sup>,以 mugben 或 mug-tun 来指称“盛京”。如崇德八年(1643)《敕建国法轮寺碑记》藏文碑记中,即将盛京翻译为 pho brang mugben。其中,pho brang 意为“宫殿,皇帝、国王居,京城”;mugben 是“满语 mukden 的音写,‘盛京’”<sup>⑤</sup>。再如蒙古喇嘛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完成的《蒙古佛教史》<sup>⑥</sup>中对,“盛京”的藏文翻译也是“穆克丹”<sup>[9]</sup>。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于同治四年(1865)撰成的《安多政教史》,将“盛京”译作“穆克顿(mug tun)”<sup>⑦</sup>。

皇太极时期,诸如官方文书《皇太极致土伯特汗书》,将“盛京”译为“莲花盛开之城”,则容易使蒙藏人民心生向往,对“大清”产生好感和崇敬,进而强化与蒙古和西藏的佛教关联,促进团结

凝聚,形成新的国家认同。

### 三、佛教意境下的“莲花净土”

清初,皇太极在盛京城敕建实胜寺和东西南北四塔四寺。在佛教意蕴中,四塔四寺“宛如曼荼罗,其中心就是盛京城乃至皇宫(pho-brang mukden),使盛京成为实胜寺碑文所说‘莲华净土’(蒙古文碑文:delgeregsen linqu-a tu oron)”,“这就是所谓‘结界’……以一些普通物品或圣物,真实地或象征地把一个区域区分出来,加以守护,成为圣域、净化之区”,而“并不是一个曼荼罗道场”<sup>[10]</sup>。这样,使“盛京城和皇宫变成焦点、被圣化了,成为实胜寺碑文所说莲华净土”<sup>[10]151</sup>。

实胜寺全名“莲华净土实胜寺”,乃是皇太极亲自赐名,“莲花净土”亦即指代“盛京”,象征佛国。《敕建莲华净土实胜寺碑记》以汉、满、蒙、藏四体解释了“莲花净土”之意。

#### 汉文寺名全称:莲华(花)净土实胜寺

① 详见李勤璞:《盛京敕建莲华净土实胜寺四体碑文录写翻译》,2017-02-01,未刊稿。李勤璞先生提供。

② 拘卢舍,梵文音译,为古印度的长度单位,也作“俱卢主”。在巴利文和藏文中,1拘卢舍约等于现在的4公里。

③ 这里“殿堂”,指的是“皇宫”“宫殿”,即“京城”。

④ 这一方位传统至今保留,如在寺庙举行佛事活动时,大殿男东女西分列,所谓“男左女右”即以佛像的左右手方向来确定。

⑤ 李勤璞:《盛京四寺藏语碑文校译》,《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1期,第100、106页。笔者认为,mukden虽然词源来自满语,但藏文 mugben 更可能是直接来自蒙古语音译,因为后金和清初充当满洲和西藏的使者多是蒙古喇嘛,档案史料中也多记载其“面商”“口传”“口述”。例如,《清实录》崇德四年(1639)冬十月,《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图白忒汗》也是让使臣察罕喇嘛等口传,信中明言“令所遣……使臣口述”,等等。

⑥ 《蒙古佛教史》,全称《大霍尔地区正法如何兴起情况讲法阐明佛教之明灯》,又名《霍尔却穹》,全书用藏文写成,另有蒙文译本。作者是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亦名央金格贝洛追晋美日必多吉。

⑦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75—176页。另有说法,此书初成于道光十三年(1833),并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和同治八年(1869)两次增补。

满文寺名汉译:在莲花的境域一定胜利佛座(寺院)

满文拉丁转写:

šu-ilhai soorin i yargiyan etehe fucihi soorin  
莲花的 座位的 实在 胜利 佛 座位(寺)  
fushuhe su-ilha i soorin i yargiyan etehe  
盛开的 莲花的 位(寺) 的一定 胜利

蒙文寺名汉译:盛开的莲花的地域,真实胜利的寺

蒙文拉丁转写:

delgeregsen linqu - a tu oron daki, mayad  
ilayurysan süm-e

盛开的 莲花 在地域的 实在 胜利 寺庙

delgeregsen linqu - a tu oron daki, mayad  
ilayurysansüm-e

盛开的 莲花 于 地域 在 一定 胜利的 寺

藏文寺名汉译:在莲花盛开的地方一定得胜寺

藏文拉丁转写:

pad-ma rgyas-pavi yul gyis rnam-par rgyal-  
bavi lha khang

莲花 兴盛之 地方 在 非常地 制胜的 神 殿

pad-ma rgyas-pavi yul gyi rnam-par rgyal-ba-  
vi lha-khang<sup>①</sup>

莲花 增上的 地方的 最为地 胜利的 寺庙

在佛教中,莲华(花)净土多指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在的佛土,也称为“莲邦”“莲华(花)国”。莲花代表佛法清净无染。据汉译《佛说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经》和《佛说观无量寿经》等描述,阿弥陀佛又名无量光佛、无量寿佛,其土“众宝莲华,周满世界”“莲华,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念佛之人命终往生极乐国土,皆为莲花化生,花开见佛。特别是在明代佛教净土信仰盛行之际,汉地佛教求生阿弥陀佛莲花净土观念非常普遍。如

紫柏真可言:“如众生能善用其心,孰非无量寿觉;娑婆孰非莲花净土?”永觉元贤禅师亦曰:“诸人须打破泥团,跳出虚空,则尽十方世界总是一个无量光佛身,尽十方世界总是一个宝莲花净土。”<sup>[11]</sup>汇集《释门疏式》的僧人释如德,自号“莲花国比丘冰雪”<sup>②</sup>。此外,藏地最为盛行的观音心咒(即六字大明咒)也是莲花喻指,“喻玛尼呗美吽”的意思就是:“真心摩尼宝,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浊,圣洁无垢,成就吧!”藏传佛教莲华部部主是阿弥陀佛。因此,莲华净土实胜寺的名称及四体碑文,也就相当于从佛教角度承认此地为“莲华(花)净土”“莲华(花)国”,是佛法兴盛之处,以庙宇建筑和碑文的神圣空和,团结满、汉、蒙、藏民族,并公开宣示“胜利”实是天命所归。

尅实而言,实胜寺的建立,其政治作用远大于宗教功能。就如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修建七大庙来配合称汗的需要一样,皇太极也是将实胜寺作为国家祭祀设施,彰显清朝立国、改元崇德,树立自身政权的正当性与神圣性。<sup>③</sup>

首先,实胜寺兴建的直接原因,是为了供奉察哈尔部归降所带来的嘛哈噶喇金佛。嘛哈噶喇,俗称大黑天。据说此佛像是八思巴所铸,历来为蒙古王室所敬奉,被视为战神。于是,皇太极“命工部,卜地建寺于城西三里许”修建实胜寺,装塑佛像,大殿供奉三世佛、八大菩萨、罗汉等,西配殿供奉护法神嘛哈噶喇。这样,在宗教层面,皇太极代表清廷继承了蒙古汗廷的信仰传统。

① 李勤璞:《盛京敕建莲华净土实胜寺四体碑文录写翻译》,2017-02-01,未刊稿。李勤璞先生提供。

② 释如德:《疏式弁言》,《释门疏式便览通用》,书林鳌峰馆发行,熊熊居藏版。《疏式弁言》为释如德亲书,落款“莲花国比丘冰雪”并钤印“释如德”。扉页印“莲花国比丘雪道人订”。(原件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图书馆,书影见于红叶古籍网:<https://hongyeshan.com/post/28720.html>。)之后,“楚南宝庆府宋三益堂重刊发行”时,改名《释门疏式雅俗通用》。此书卷七有《荐辽东阵亡将士疏》,以“大明”正宗。笔者揣测,自署“莲花国”,除了佛教涵义之外,可能也有明末身处辽东后金政权统治之下的隐喻。

③ 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详见李勤璞:《民众信仰与国家建构:关于黑秃阿喇的七大庙》,《后金时代和清朝初期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36页。

第二,实胜寺是皇家寺庙,皇太极率满、蒙、汉诸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员等礼佛和祭拜嘛哈噶喇的规格,近于最高的“国礼”,“焚香”<sup>①</sup>、“免冠”“行三跪九叩头”<sup>[12]356</sup>。皇太极在天聪十年(1636)正月壬子即祭祀嘛哈噶喇,又于崇德三年(1638)八月十二日实胜寺建成之日,以及崇德四年(1639)正月初三日、崇德五年(1640)正月初六日亲自率众到实胜寺礼佛。等于公开表达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和护持,有助于凝聚蒙古诸部归心,认同新生的国家。

第三,实胜寺满文碑文由“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满文,学士罗绣锦译汉文,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译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译图白忒文”<sup>②</sup>,立碑二方,东侧碑前满文后汉文,西侧碑前蒙文后藏文。满、汉、蒙、藏四体碑文,代表了民族一家,江山一统。

#### 四、联合满汉蒙藏的清初国都“盛京”

皇太极宣称“于满洲、蒙古、汉人,不分新旧,视之如一”<sup>[16]180</sup>,他在盛京显示出宽厚的“恩养”胸怀,招徕蒙古,恩威并济,并积极与西藏通使联系,促成了后来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皇帝。

天聪十年(1636)四月初八日,满、蒙、汉文武百官恭请皇太极上尊号“宽温仁圣皇帝”<sup>[11]1</sup>。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四月初八这天也是佛诞日,可谓意味深长。三日后,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宣布“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并率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昭告天地。于是,盛京成为清朝立国的都城。《清实录》如是记载:

满洲、蒙古、汉官,捧三体表文,立于坛东,以上称尊号建国改元事,宣示于众曰:我皇上应天顺人,聿修厥德,收服朝鲜,统一蒙古,更得玉玺,符瑞昭应,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是以内外诸贝勒大臣,同心推戴,敬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sup>[2]</sup>。

皇太极对“汉人称其国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表示不满,他认为天子必须是有德者方堪任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必有德者乃定天下,称有德者为天子矣”“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上天降遣,另择贤能为国主,此为天意也。”<sup>[12]167</sup>由此,可以隐约看出他改元“崇德”之

意图。

在祝文中,皇太极将“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边疆”<sup>[2]</sup>作为自己的伟大功绩。而接连获得蒙元王室的嘛哈噶喇金佛和玉玺,更被视为“天意”“天眷”。天聪八年(1635)十二月十四日,墨尔根喇嘛载嘛哈噶喇金像来归,被视为“天运已归”<sup>[2]</sup>;不久,天聪九年(1635)九月癸丑,又得到“制诰之宝”玉玺,蒙古部众甚至称之为“历代帝王传国玉玺”<sup>[2]</sup>。受玺当日,仪式隆重,“设黄案,焚香,吹螺,掌号”,皇太极不仅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而且“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也”<sup>[2]</sup>。

改元崇德前后,皇太极在盛京进行了一系列祭祀和宗教活动,如建立太庙、谒堂子、礼佛、创建实胜寺,后又建立东、西、南、北四塔四寺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亦载:“我满洲国,自昔敬天与佛与神出于至诚,故创基盛京即恭建堂子以祀天,又于寝宫正殿恭建神位以祀佛菩萨神及诸祀位嗣。”<sup>[13]</sup>其中,关于实胜寺的建立时间,颇值得玩味。

在《敕建莲华净土实胜寺碑记》中,实胜寺建于“崇德元年(1636)”,历时三年,于崇德三年(1639)建成。这使人很容易将清朝立国与皇太极兴建实胜寺二个重大历史事件自动关联,仿佛建寺是立国之后的一桩宗教大事。但是,细细考究,却不尽然。《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天聪九年(1635)七月二十五日,皇太极致书朝鲜国王,

① 康熙本《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0,崇德五年正月六日,转引自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524页。通行的乾隆本则删去了“焚香”二字。

②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43,崇德三年八月十二日。其中,汉文碑文大量文字与《文选》中的《头陀寺碑文》内容重复,有关二者之比较研究,详见李勤璞:《盛京实胜寺汉文碑记研究》,《辽河文物学刊》,1994年第1期。但是,笔者不太认同“碑文的满汉体两体,应是汉先满洲后”。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355页,满文碑文中详细地记载“制绘佛身,排列佛、菩萨等位总指教毕礼克图囊苏”,但是汉文碑文中仅略作“指使塑画毕力免朗苏”。所以,笔者认为,碑文形成的顺序应是:满文碑模仿《头陀寺碑文》为底本写就,形成在先;之后,汉文碑根据《头陀寺碑文》和满文碑完成。

为建造实胜寺求取颜料,书信中言:“今虔造寺宇,供奉此佛”,说明实际上已开始修建事宜;天聪十年(1636)正月六日壬子,皇太极“命备陈诸祭物,祀嘛哈噶喇佛”,并“礼祀”“佛殿左侧”之沙尔巴库土克图的镀金银舍利塔。这座佛殿,即是实胜寺的西配殿,当时已经基本竣工。之所以后来满、汉、蒙、藏四体碑文皆言“崇德”建寺,大概是有意突出“立国”祀典。

而且,通过祭祀嘛哈噶喇、创建实胜寺等,皇太极也塑造了自身崇佛的形象,拉近与蒙藏民族关系。与此同时,他积极遣使入藏,希望迎请达赖喇嘛等藏地高僧来盛京弘法。崇德二年(1637),喀尔喀、卫拉特、土谢图三部汗王听闻皇太极欲延请达赖喇嘛,皆表示愿一同前往迎请<sup>①</sup>。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如明清交战胜负未定,加之五世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喀尔喀蒙古与皇太极的关系一度躲闪暧昧,故五世达赖喇嘛并未立即前往盛京。但是,他和四世班禅也清楚“居尔济特<sup>②</sup>(女真)汗王势力强盛”<sup>[14]</sup>,希望借助皇太极力量发展格鲁派,于是托使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带去了书信,极力赞扬皇太极,预示其将成为统治众生的帝王,希望他护持佛教。

与轮回三界的其他有情众生相较,获得暇满之宝贵人身已如白昼之星辰一般稀有,而众人中成为统治众生之帝王者又更加如如意宝一般难得,故此愿陛下在斗争时和成为众生之主宰的大皇帝之时,对所有众生如法护佑,则与博格达皇帝之名号相符,尤其是顾念利乐之根本——佛陀之教法,善加护持<sup>③</sup>。

《蒙古佛教史》记载,皇太极还依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受灌顶。崇德八年(1643),当伊拉古克三返回西藏时,“皇帝奉献了大量物品,私下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奉为上师,寄赠了大量物品,并请求说:‘我即将把大明皇帝的臣民收归治下,待完成大业之时,将迎请二位佛爷,拜见金面,弘扬佛法。’”<sup>④</sup>这样,皇太极通过官方和私人两种途径,密切了与藏地的关系。

顺治皇帝定都北京之后,盛京作为陪都,但依旧具有重要影响力。后世帝王尤对盛京之佛教元素记忆深刻,甚至从乾隆皇帝开始,将实胜寺想当

然地理解为是证明得胜之缘故,而将修建四塔四寺视为统一天下之先兆<sup>⑤</sup>。乾隆皇帝曾就建都盛京以及创建实胜寺作诗多首,阐述其中因由,如:

① 详见《蒙古各部为同意邀达赖喇嘛事复皇太极书》(1637),《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马哈撒嘛帝塞臣汗位共邀达赖喇嘛事致崇德帝文》(1637)、《土谢图汗致崇德帝协商与卫拉特三方共邀达赖喇嘛之文》(1637),载希都日古编译:《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② 居尔济特,也作济尔齐特,本指金朝,也被用来指称后金、女真。

③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2—83页。这封信在蒙藏佛教界颇为流传,早在《蒙古源流》中已有记述:“(纵)观一切智三界中生死轮回的其他众生,(感到)要获得自由人的宝身,比白昼升起的星辰还要珍奇。其中,要成为收服一切的皇帝,则犹如如意珍宝一样难得。因此,在(您)成为当今这争斗时期的威严大力皇帝的时候,如果能以政教(二道)养育大国的众生,就是作为皇帝的功绩了。所以,(您)应当扶崇胜者(释迦牟尼)的教法,成为胜教的教主。”并载,皇太极“欣然受灌顶引导”,说:“我即将攻取大明皇帝的都城。我愿在理毕俗世功业之后派人迎请两位上师,在你们的面前行叩拜礼,弘布佛法。”(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第473—474页。)五世达赖喇嘛在《自传》中还曾写到:“关于我是否去蒙古地方,有不少议论……固始汗与嘉莫切瓦(大王妃)坚持要我去青海。我通过苏尔共钦向日增岳摩瓦活佛请教该不该去青海,日增岳摩瓦在回信中说:‘现在的蒙古人并不是真正的邀请者,待到若干年以后,与蒙古人服饰不同的人会从东方前来迎请,请你到时候前往,但是不是要久留,即时返回。’后来,此言果得灵验。”(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这应该也是他积极与清廷建立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④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3页。此亦载于《蒙古源流》。

⑤ 乾隆皇帝在《实胜寺》诗中自注云:“崇德六年八月,太宗以偏师破明总督洪承畴兵十三万于松山杏山而归,建实胜寺于盛京以纪功绩,圣人神道设教所以顺人情、安国俗也。”又在《法轮寺》诗中自注云:“相传,当时有喇嘛善相地术者,曾云:‘四塔全,当一统。’果符所言。果然一统成佳兆。”爱新觉罗·弘历:《实胜寺》,《钦定四库全书御制诗四集》卷100《古今体八十一首》,第1a—2a页。

“沈阳既建都,佛宇于焉构,名之曰实胜,义盖叔孙取”“天聪建年后,蒙古日覲来,介绍风佛者,梵宇于是开”<sup>[15]</sup>,等等。嘉庆皇帝也感言,盛京“八门四塔,奥义蕴藏”<sup>[2]</sup>,认为盛京建筑具有秘意。虽然,后来“盛京”之佛教意蕴逐渐弱化,但是有清一代,帝王多深谙佛教对团结满汉蒙藏诸民族的积极作用。

#### 参考文献:

- [1]李保文.崇德年间藏事档案译稿[J].历史档案,2001,(1):20.
- [2]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钦定盛京通志[M].卷23,建制沿革:24b、28a.
- [4]长山.满语词源及其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88.
- [5][朝鲜]佚名.史料续编·沈馆录(附沈阳日记)[M].台北:广文书局,1969.
- [6]李勤璞.蒙古之道:西藏佛教和太宗时代的清朝国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07.
- [7]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M].希都日古,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8.
- [8]李勤璞.斡祿打儿罕囊素:清朝藏传佛教开山考[A/C].后金时代和清朝初期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40.
- [9]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M].陈庆英,乌力吉,译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81-82.
- [10]李勤璞.西藏的佛国境界:盛京四郊喇嘛寺塔的敕建[J].美术学报,2012,(2):38-39+43.
- [11]道需编.永觉元贤禅师广录[M].卷3,再住鼓山涌泉寺语录.
- [12]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 [13]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M].卷一.
- [14]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M].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58.
- [15]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御制诗文全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谷文双]

##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Name Shengjing During Huang Taiji Period

WANG Jia

(Minzu Institution,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Shengjing” is regarded as “the city of lotus in full bloom” and “the pure land of Lotus” in the context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culture. “Lotus in full bloom” symbolizes the prosperity of Buddhist dharma, which endows “Shengjing”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Buddhist kingdom”. It never existed originally in the Chinese and Manchu language. Since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ethnic groups believe in Buddhism, the Buddhist meaning of “Shengjing” as the capital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a series of Buddhist activities in Shengjing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 Shisheng, the foundings of four towers and four temples are also a strategy by Huang Taiji, who uses Buddhism to condense Mongolia and Tibet and form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Da Qing”.

**Keywords:** Shenyang; Shengjing; Tibetan Buddhism; Temple Shisheng; Temple Falun